

“纸螃蟹”横行，漏洞如何堵？

□□ 韩啸



在今年躁动的大闸蟹市场中，一个被人称作“纸螃蟹”的“新品种”颇为引人关注。所谓“纸螃蟹”，其实就是可以用来兑换大闸蟹的购物券(卡)。作为预付产品，它的初衷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购蟹需求、提供新的消费体验，也起到拉动和刺激产业发展的作用。然而，“纸螃蟹”横行的真实情境却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比如很多蟹券存在店家跑路、标价虚高等问题，还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收到的大闸蟹品质、大小与商家承诺的严重不符，有的甚至2-3年都未能成功提货，最终超过卡券规定的提货日期而不了了之。

更令人咋舌的是，一些经销商一边高价卖券，一边打折收券，即使一只螃蟹都没卖出，也能收益颇丰。比如某厂商印制标价1000元的螃蟹券，且印制数量可能远大于其实际供给能力，并以600元的价格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再将蟹券以800元卖给消费者；当消费者兑换大闸蟹时，不是被厂商以货源紧张等理由搪塞，就是收到了品质低下的产品。感觉上当了的消费者无奈只好将蟹券卖给黄牛，黄牛通过200元的极低价格将蟹券回收，再以400元卖回给厂商。这样一来，转了一圈的“纸螃蟹”最终回到了它的“主人”那里，整个过程有可能一只真螃蟹也没出现，厂商、经销商、黄牛们却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正视改厕中的新问题

□□ 段官敬

下村调研，有贫困户反映家里新改厕所的马桶“咕咕”响，像“打嗝”一样，放不出水来。经调查发现，原来马桶的冲水箱根本就没有接通水，变成了摆设。本是改厕，结果又变回了“老旱厕”。

“厕所革命”虽是细微之举，却属民生大事。一方面，冲水马桶等设施可以避免传统旱厕带来的细菌和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干净、整洁、舒适的如厕环境能让群众“方便”起来更方便，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过去，基层群众“谈如厕色变”，常说：“踮着脚练水上漂，捏着鼻练闭气功。”随着“厕所革命”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如厕环境问题本来已经翻篇了，但少数地方存在的厕所“打嗝”现象，却让改厕成了“半吊子”工程。既浪费了资源，也损害了群众利益，还容易引发生态主义歪风。

其实，不仅是马桶冲不出水，其他诸如没用几天就坏了、排泄物处理系统不过关等现象，同样是“厕所革命”中仍存的问题。设施一摆之了，只验收表面工程，如此“改厕”要不得。这也暴露出个别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改厕政绩，只求其面不求其里的错误发展理念。

改厕就得真改、实改、彻底改，对焦群众真实诉求，打通最后一厘米。厕所“打嗝”，打掉的是群众满意度，“隔”掉的是实干作风。要想让厕所真正畅通，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树立急民之所急的意识，更要从农民使用角度出发，多查查看到底改得如何、老百姓用起来是否方便，进一步推动改厕工作切实到位。

应对“纸螃蟹”横行的诸多乱象，首先，蟹券的发售单位必须是具备一定资质的主体；其次，有关立法部门也有必要对类似于蟹券这样的预付卡合同审批制度进行立法，严格规范预付卡格式合同制定的有关程序；最后，行业协会也应该成为整肃“纸螃蟹”市场乱象的中坚力量。

有了类似于“期货”一般的金融属性，也给了厂商、经销商们较大的“回旋余地”。同时，大闸蟹产区相对固定，产量难以在短期内有显著提升，由此就形成了整个交易过程中的闭环链条。

基于这些因素，就不难理解蟹券交易中存在的“金融风险”了。作为一种预售商品，已支付全款的消费者很难知晓经销商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一旦厂商、经销商出现资金链断裂、货源不足、以次充好等问题，首要的受害者就是全款买券的消费者。同时，横行于市的“纸螃蟹”也很可能误导蟹农，让他们对市场行情做出错误判断，一味扩大生产规模，对打造品牌、提升养殖技术和螃蟹品质变得没那么在意。

那么，如何应对“纸螃蟹”横行的诸多乱象？

首先，蟹券的发售单位必须是具备一定资质的主体。目前各种预付卡，比如超市购物卡、代金券等，需要到相应的中国人

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交纳保证金；如果是经营主体自行发售的指向特定商品的预付卡，则需向各级商务部门交纳保证金。而不少卖蟹券的商家没有相关资质，更谈不上交纳足额保证金。因此，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对“纸螃蟹”各销售主体加强监管，通过缴纳足额保证金，有效遏制投机分子利用电商、微商等渠道囤钱。

其次，“纸螃蟹”买卖合同多以发售机构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投诉和纠纷中常常通过随意修改合同条款、隐瞒霸王条款、将商家责任模糊处理等方式减轻或免除自身违约责任，侵害消费者权益。因此，有关立法部门也有必要对类似于蟹券这样的预付卡合同审批制度进行立法，严格规范预付卡格式合同制定的有关程序。只有当有关主体遵守一整套规范、完善的商业预付卡管理规章制度时，才能通过审核开展相关业务。

最后，行业协会也应该成为整肃“纸螃蟹”市场乱象的中坚力量，严格控制协会内各生产主体的发券数量并审查合同是否规范，构建以虚拟产品惠及蟹农的长效机制。同时，对消费者来说，在享受“纸螃蟹”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应时刻警惕大闸蟹“金融陷阱”，增加金融预付卡等方面的知识储备，提升对各种“纸螃蟹”的鉴别能力。只有社会多方共同努力，才能给“纸螃蟹”绑上蟹绳，让它不再横行于市。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产业扶贫要做到「目中有人」

在华东某镇，数年前上了一个扶贫养鸡项目，扶贫工作队来时，政策、资金充足，各级领导重视，经营红火。然而，扶贫工作队走后，后续政策支持却跟不上，导致管理混乱。该项目转包不到2年，情况就急转直下，产品滞销、鸡舍破败，亏损数十万元，以至陷入烂尾窘境。

“干部一走，产业就散”，类似的情况在基层不算少见。并不单是扶贫领域，很多地方产业的发展其实都会面临这种因人事变动带来的政策调整风险。而在扶贫领域，由此产生的冲击会更明显、更直接——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大量缺乏独立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因此，外力的更迭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倾覆性的。甚至在某些地方，项目上马时有多红火，落幕的时候就有多荒凉。某地一个贫困村，第一书记进驻后帮地方因地制宜地规划了农业产业集聚园区，分3期实施，项目前景良好。然而，第1期项目刚刚完成、初见效益的时候，第一书记便期满离任。而继任者由于对前任的发展思路和资源供给不能有效接力，造成发展空间和断层，后续项目无法跟上造成的环保问题，导致该项目曾一度被当地执法部门责令关停。在某些贫困地区，随着部分扶贫干部期满离任，引发了催款潮，部分产业面临停摆危机。这些现象固然暴露了一些地方产业政策缺乏连续性，但同时更折射出当地产业扶贫的困境所在——这些借助外力发展起来的产业并没有真正在地方上扎下根来，成为我们期望中的“转化成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长久生命力”。

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强调在扶贫中必须切实通过产业发展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保证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避免贫困户短期内收入得到增加、长期却没有产业支撑持续增收的现象。这也是产业扶贫的价值所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产业扶贫工作，明确把产业扶贫摆在“五个一批”的首位，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但是，一个地区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绝非易事。从实际情况来看，产业扶贫也是“五个一批”工作中最难的一项。关键就在于，产业扶贫的成功与否并不依赖于政府职能的发挥，而是取决于市场机制配合作用的效果。在当前各地脱贫攻坚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推手”，于产业扶贫而言效果可能就不那么灵光了。应该看到，某些贫困地区尤其是一些贫困村的产业，确实是靠着外来扶贫干部或工作队的个人的资源、能力、信誉支撑起来的。当然，这本来也是派驻扶贫干部的初衷之一。这种外力的介入，带来了本地所不具备的信息、市场、资金、人才，能够快速的地方产业发展打开局面。但与此同时，一些过分大包大揽的做法也让地方患上了“依赖症”，以至于出现上述“干部一走，产业就散”的困境。

长期从事扶贫问题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从2015年起带着学生在位于中、缅、老3国边境的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帮助村民通过发展“瑶族妈妈”客房项目开展扶贫，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政府的推动下，让河边村这样一个边境贫困村3年大变样，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值得自豪的一个案例。”但是随着实践的推进，李小云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他和他的学生开展的一系列产业促进工作，诸如宣传、联系客源、开具发票、现场接待等都没有当地农民的参与。“这些工作农民都做不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工作是啥、怎么做的。”这让李小云感到很困惑——如果他和他的学生们撤走了，农民还能继续有这样的收入吗？

我们的产业扶贫工作迫切需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这也是未来更好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关键所在。我们都希望能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贫队伍”，但事实上真正不会走的队伍只能是农民自己。无论是外来的扶贫干部，还是各类公益组织、社会力量，他们的帮扶必须要谋求更大的能量转化，真正通过市场机制嵌入到地方经济发展的肌体中，成为当地群众自我的动能和力量。

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很多地方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向壮大主体、规范行为、提升水平的新阶段过渡。他们通过搭建各种产业扶贫平台、培育和引进新型经营主体等途径，实现了“产业发展壮大、新型主体成长、农民脱贫致富”同步前进的目标。

产业扶贫本质是经济活动，要扶植的是产业，更是人。无论是“鱼”也好，“渔”也罢，最终都是要交到人的手里，人才是所有命题的核心所在。产业扶贫必须要做到“目中有人”，只有人立住了，人起来了，所有的一切才能有依托，稳定脱贫才能成为可能。只有人成长了，人发展了，产业扶贫的效力才能实现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的更大扩展，为脱贫攻坚提供更强大的支撑。



“麻将馆禁令”为何引发舆论质疑？

□□ 柯利刚



近日，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发布通告称，“为了治赌，依法对全县范围内营业性棋牌室、麻将馆、宾馆麻将房等予以取缔”。

“麻将馆禁令”发布不久，因为涉及到治理赌博，有人“举双手表示赞同”；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江西地面已经容不下一张麻将桌”，认为治理方法存在“一刀切”的嫌疑，虽有助于打击赌博，但也漠视了普通群众正当合法的娱乐需求。

近些年来，舆论场对于“一刀切”式的治理方法可谓并不陌生。此前就曾有过某些地方“一刀切”地禁止披麻戴孝。因此，某地治理方法一旦被贴上“一刀切”的标签，舆论场立刻就会露出“牙齿”撕咬。

面对汹汹舆论，玉山县将通告名称更改为《关于对利用棋牌室等场所实施赌博违法犯罪开展集中整治的通告》。更改后的通告名称，取消了“取缔”的说法，并强调打击范围只针对“赌博违法犯罪行为”。至此，负面舆论算是有所平息。

事实上，近期发布“麻将馆禁令”的地方，除了江西上饶市信州区、玉山县、万年县、鄱阳县以及丰城市等地之外，还有安徽池州、湖北十堰等地。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要跟“麻将馆”过不去呢？这就涉及到赌博和治赌的问题。

赌博的危害性大家是清楚的，因为赌博，妻离子散者有之、家破人亡者有之、结仇夺命者亦有之，所以有人把赌博称之为“社会之癌”。但赌博的特性大家可能知道得并不全面。赌博具有隐蔽性，一伙人真要赌博，往往是藏在暗处，而且赌得越大，藏得越深；赌博又具有随意性，一伙人可能一开始并未想起要赌博，但聚到一起，激发了想法，某个人提出这个话头，大家说赌也就赌上了；赌博还具有反复性，一个人因为赌博输了钱，吃了教训，一时之间可能不赌了，但时间一久，“好了伤疤忘了疼”，看到别人赌，心里不禁发痒，一时没控制住，就又走上了赌博的道路。

除此之外，赌博还具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就是行为界定上的模糊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对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要进行相关处罚。”但目前对“赌资较大”并无清晰界定，这就使得对于赌博的认定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比如有的地方，总赌资超过500

元，就算聚众赌博；有的地方，每个筹码超过5元，也算赌博；江西规定，个人赌资在200元以上的，就算赌博。

以上种种特性叠加在一起，无疑会加大具体执法环节的难度。除此之外，治理赌博还面临一个现实难题，那就是警力不足。基层公安机关的警力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广大乡镇地区，“警民比”更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警力不足，基层群众的居住地又较为分散，赌博的认定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赌博本身又兼具相关特性，即便是把有限的这点警力都用于常规化治赌，效果也不见得好。

既然常规化治赌费力大、效率低，那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呢？正所谓“捉拿提领子，牵牛牵鼻子”，治理赌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有效抓手。而“棋牌室、麻将馆、宾馆麻将房”等扮演的正是这样的“抓手”角色，对准“抓手”，集中“动刀”，用一段时间整治一个突出社会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站在治赌的层面来看，“麻将馆禁令”虽不是最优治赌方案，但却是最能有效落地的治赌方案。所以说，“麻将馆禁令”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刀切”，其中也不乏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那为什么玉山县等地的“麻将馆禁令”却掀起了舆论风波呢？根源在于，不

是“动刀子”不对，而是在“动刀子”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力度和准度，容易误伤，也容易戳中舆论的痛点。假如一开始，就瞄准了“赌博违法犯罪行为”动刀，相信收获的不会是漫天的口水，而是雷鸣的掌声。比如安徽池州，虽然也发布了“麻将馆禁令”，但打击的对象是“非法”经营的棋牌室，因为“动刀”精准，没有误伤，也就没有引起负面舆论。

此次事件，聚焦来看，是一个通告名称的问题；放开来，是应对舆论的问题；往深了看，则是行政治理能力的问题。就行政治理方式而言，一些地方，比较偏爱硬性执法。硬性执法，简单易操作，对于一些特殊问题，比如赌博问题，有特殊的“疗效”。但在网络化时代，每一个人、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媒体发布中心”，单纯的硬性执法，越来越经不住千万双在场或不在场“电子眼”的聚光与曝光。

不管是赌博问题的复杂程度，还是现代治理的转型升级，都要求地方政府在治理的时候，更要注重把好政策执行的边界。该切割的地方，毫无遗漏地切割；不该切割的地方，毫发无损地保留。尤其是执法部门，更要注重依法办事。于法有据、于理要合、于情无碍，方能将好事办实，支持政策的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各位读者，本版长期面向社会征稿，欢迎各界人士针对三农时事热点踊跃来稿来论，稿件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请发：nmrbpinglun@163.com

让农村金融供需更通畅

□□ 周慧虹

最近，笔者深入基层开展金融支持农村清洁供暖情况调查，从当地金融机构、政府、信贷需求方各听到了一些不同说法。

涉农金融机构表示手头有可用资金，无奈找不到合适的支持项目，也不完全了解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于绿色信贷有何扶持政策；地方政府苦于农村地区清洁供暖工作困难多，财政补贴压力大，抱怨金融机构不担当不作为；而一些清洁供暖企业又反映经营资金不足，亟待金融扶持，还有些打算从事秸秆回收加工、沼气生产的创业者，因缺乏启动资金迟迟无法行动。

无论是当地金融机构，还是地方政府、信贷需求方，他们都站在各自角度，道出了客观实情。由此反映出的则是，当前农村金融运行依然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供需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尽管如今已进入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各种数据、资料的获取越来越便捷，可毕竟人的精力有限，更何况不同的市场主体还有各自的工作要做，不可能及时、全面、深入地了解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尤其需要看到，现实当中基于种种主观原因，社会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尚未被打破，这些

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银、政、企各方的顺畅沟通，也因此造成如下局面：一方面金融机构有资金放不出，另一方面户户有需求贷不到，而地方政府干着急没办法。

打通农村金融供需之间的“肠梗阻”，关键还是要尽快架桥铺路，搭建起适宜的平台。在县域地区，熟悉当地情况的自然是政府，对经营主体资金需求的有效洞察，政府的相关信息将会起到重要作用，这就决定了政府的主导力往往很强，理应成为当地金融供需服务平台的重要构建者。

除此之外，人民银行县级支行在促进金融供需当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作为货币政策的贯彻者，县级人行对于金融相关方针政策有着系统性的掌握，同时，其所拥有的征信管理、支付结算、金融统计与调查等手段工具，也可作为服务平台的顺畅运行给予有力支撑。而人行联手当地政府，既可以推动政府将需求方的动态数据信息共享出来，又可以协调政府的多重部门及商业金融机构，充当好“枢纽”角色。

县域政府与人行携手，不仅要为金融供需之间搭建好服务平台，让相关数据信息在“线上”畅通流动起来，更重要的是，还须积极利用线下手段实现数据信息真正落地。